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国学运动的起源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

张瀚墨

JRUCWP2024069

2024. 09. 27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
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国学运动的起源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

张瀚墨

［摘要］本文从源头上对国学在20世纪初的产生和20世纪20年代的重要发展进行了梳理。在梳理中发现，国学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最早一批旅日学者在日本民粹主义和日本古学的影响下建立中国古学的尝试，与日本古学发展过程中以汉学为他者加以排斥和改造的做法不同，20世纪初的中国国学是以满清统治为他者，而对于西方的影响，与明治以来的民粹主义思想一致，并不排斥。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主张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即以西方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理，从而将国学定义成国故学，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学校设立国学研究机构将这一主张变成了现实，科学的国学一时间成为一个时代国学运动的主流。

［关键词］国学；国粹；整理国故；传统学术；现代化

国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经产生，就成为中国学术史的一部分。国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尽管以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地意识到自身以及自身所依存的社会被边缘化的屈辱为背景，却不仅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术彻底地反思自身的开始，也是中国学术自觉地将自己纳入现代学术话语体系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本文所讨论的，是从学术史的维度溯本清源，试图从源头上厘清国学起源及其在20世纪前30年的发展脉络，希望能有助于我们审视当下国学发展的内容和本质，并对我们思考当下国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和国学未来发展的走向能够有所启发。

一、国学概念

我们在这里所关注和讨论的国学，不是指《周礼》《汉书》等古代典籍中所称的由国家和政府设立的学校，[①] 而是指被有些学者一开始定义成“一国所自有之学”或者“中国的固有文化”的那个“国学”。[②] 从时间上说，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国学指的是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多数人眼中，这一现象与晚清以来东西方列强的入侵直接相关，被视作西方思想如洪水猛兽般涌入中国之后、由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日益增强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所催生的事物和现

作者：张瀚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成员，hanmochang@yahoo.com。

＊　本文受中国人民大学重大研究工程“文明史研究工程”（ZDGC20220001）资助。

① 刘梦溪：《国学与红学》，7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② 邓实：《国学讲习记》，载《国粹学报》，1906（7）。

象。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开始使用“国学”一词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西学或新学的对立物①；顺着这个思路再进一步，有学者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所谓“国学”，其实就是“国将不国之学”②。

在晚清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通过对国粹派和国粹思潮的讨论来研究20世纪初年的国学现象。这或许与当时使用这些概念的学者没有对它们进行明确定义有关。有学者认为，在清末民初的二三十年间，“国学”“国粹”“国故”甚至“国魂”这几个词，在许多人那里都没有多大区别，几乎可以互换使用。③ 但细究“国粹”一词，不见于我国经籍，属于东洋舶来品，直接与日本明治时期由民间发起的国粹主义风潮有关。④ 其实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早就明确地说道，“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⑤ 之后他又在不同的场合解释他所说的国粹与日本国粹主义风潮的关系，解释国粹的内涵。如在《国粹保存主义》中，他认为国粹乃“国家特别之精神”，进而将其详细解释为“发现于国体，输入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其特征表现为“有优美而无粗犷，有肚旺（‘肚旺’不辞，疑当为‘壮旺’。笔者按）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蔽，为人群进化之脑髓者”⑥。他在强调保存国粹、创办《国粹学报》初衷时，并不隐晦其名称的东洋源头，皆举日本国粹主义风潮中坚人物为例加以解说，如“昔者日本维新，归藩覆幕，于时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杂志，倡国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⑦。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国学的起源以及国学与国粹的关系至为关键。

而梁启超似乎比黄节还要更早地在文章中使用“国粹”一语。他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就使用了国粹一词：“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⑧ 之后不久，他在给黄遵宪的信函中讨论拟创办《国学报》一事，似乎亦使用了“国粹”一词。黄氏复函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日本国粹主义可行的原因，相比而言，因为中国“尊大”“固蔽”之“旧习”阻碍革新，所以此时不宜提倡保存国粹。⑨ 总之，黄氏复函，证明“国粹”之语源，已为了解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而梁启超、黄节等人，无论其立场如何，他们借鉴日本当时所奉行之思想以图改造我国国民思想、再造国民精神以达强国目的的努力，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清末民初这批大多有留日背景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提倡保存国粹，显然是有意识地借用日本明治时期国粹主义的主张来试图改变中国社会。

二、东洋的国粹主义

日本国粹主义的兴起，学界通常以1888年由三宅雪岭（即黄节在不同场合所提到的三宅雄次郎）、杉浦重刚和志贺重昂等人创办《日本人》杂志以及围绕该杂志而结成政教社这一民间团体为标志，因此以三宅雪岭和志贺重昂等人为核心的政教社就被看成是提倡国粹主义的急先锋。《日本

① 刘梦溪：《论国学》，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② 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载《中国税务》，2007（10）。

③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自序”，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87-89页，人民出版社，2001。

④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何晓明：《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150-151页，商务出版社，2006；刘梦溪：《论国学》，38-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⑤ 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载《政艺通报》，1904（1），转引自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⑥ 黄节：《国粹保存主义》，载《政艺通报》，1904（22）。

⑦ 黄节：《〈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1905（1）。

⑧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合集》第6册，8页，中华书局，1936。

⑨ 黄遵宪着，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卷，433页，中华书局，2005。

人》杂志创立的第二年，又有陆羯南和福本日南等人创立《日本》杂志，秉持与《日本人》同样的立场和主张，而且双方相互往来交流频繁，因此《日本》与《日本人》杂志同仁一起被统称为政教社集团。[①] 他们都主张在全日本社会西化的过程中要认识国粹，保存国粹，要注意对国民实行国粹主义道德教育，并以此来折中回应明治时期由政府主导的过度西化的倾向。[②]

根据 Martin Bernal 的研究，“国粹”一词从 1887 年就开始得到了普遍地使用，因此并不是《日本人》的专利。[③] 该词反映了一部分日本人对日本从江户时代就开始的西化努力所进行的反思。从政府的角度，西化的目的是向西方人证明，日本民族已经“文明”到足可以取消西方人在日本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的地步；但到了明治时期，这股由日本政府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牵头提倡的日本社会全面西化的风气，发展到愈加一发而不可收的地步，以至于到其发展高峰的鹿鸣馆时代，像井上馨和伊藤博文这样的高官政要，为了取得与西方各国平等的地位，在政府修建的模仿西方文化的奢华社交场所鹿鸣馆，“于彩灯、狂呼乱舞的欢乐场通宵达旦”[④]。正是在以鹿鸣馆为标志的这种狂热而肤浅的西化背景下，由三宅雪岭和志贺重昂等领导的民间保存国粹主义声音，与代替井上馨和伊藤博文上台的大隈重信和黑田清隆内阁的改弦易辙上下呼应，掀起了后来被黄节、梁启超、刘师培等拿到中国的国粹主义风潮。

关于“国粹”一词的含义，志贺重昂在阐发《日本人》杂志的办刊原则时是这样解释的：

> 千百年来，大和民族的成长有目共睹。在这个谜一样的过程中，一种特有的国粹（nationality）［括号中英文为原文所加］得以萌生发展。通过与其环境相应相化，这一国粹与日本领土的存在相适相从。经此孕育、出生、成长和发展过程，国粹就成为数千年来由大和民族纯化相承的传世之宝。[⑤]

值得指出的是，志贺重昂在“国粹”一词之后自注，认为该词等同于英文中的 nationality，这或许是志贺氏的误解，因为 nationality 的基本意思为“国籍”或是“民族”，似乎与他此处对国粹含义的解释并不一致。如上所述，志贺重昂的解释强调国粹与国土、环境以及大和民族漫长而神秘的历史中自我孕育、自我发展、生生不息的精神性存在有关。根据 Bernal 的分析，志贺重昂在这里所说的国粹，是一个浪漫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概念，有着深刻的斯宾塞社会学理论影响的痕迹：与 19 世纪的很多哲学家一样，斯宾塞相信进化与适应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历史发展模式在逻辑上必要、道德上正确的推论。斯宾塞的理论盛行于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这就难怪为什么志贺氏的国粹概念看起来与之如出一辙。[⑥]

既然国粹如此抽象，保存国粹到底意味着保存什么就成了国粹主义难以回答的问题。在否认了佛教、儒教以及其他宗教或哲学思想有资格称得上国粹之后，志贺重昂和他的政教社同仁们选择了日本艺术作为日本国粹，以与西方的数学与科学相区别。但这一选择却并没有为多数国粹主义者所接受，因为他们想要的，仍然是一个要比日本绘画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定义。正因如此，国粹又被表述成一个具有不可言说、为一国所特有、且难以被复制的精神属性的概念[⑦]，实质上就是日本大

---

①② 赵德宇等：《日本近现代文化史》，103、103－104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③ 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Furth（ed.）. *The Limits of Changes: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 101.

④ 木村毅：《文明开化》，50 页，至文堂，1954，转引自赵德宇等：《日本近代文化史》，102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⑤ 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Furth（ed.）. The Limits of Changes: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 101. 原文见志贺重昂：《〈日本人〉が懐抱する処の旨义を告白す》（发表于 1888 年 4 月），后收入《志贺重昂全集》第 1 卷，1 页，志贺重昂全集刊行会，1928。

⑥⑦ 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Furth（ed.）. *The Limits of Changes: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 101，p. 102.

和民族所独有的、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国民的民族性格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然与文明整体。这一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独特性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优越论之间的界线，其实是比较容易模糊的，这或许也是国粹主义思想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强调国粹为一国所独有，但国粹派却并非极端排外分子，他们并不强烈要求全面抵制西方文化对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反对来自西方的压倒性影响，而并不反对日本社会对西方文化与科技的学习和吸收，认为只要能小心甄别、将异域的影响控制在不对国粹造成伤害的地步就可以。① 这一点，黄节等鼓吹在中国保存国粹的知识分子于20世纪初引进“国粹”这一概念时也注意到了：与以政教社集团为核心的日本国粹主义者一样，黄节等在主张国粹“本我国之所有”的独特精神同时，并不盲目排外，反而认为“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之者，亦国粹也”。② 这不仅是清末民初我国的国粹保存主义来自东洋之又一见证，更重要的是，这让我们看到当时中国的国粹保护主义在对待西学态度上所呈现的兼收并蓄的特点。

三、清末民初的国粹派

与对待西学的宽容态度相比，清末民初的国粹派对待帝制、尤其是满清专制政府则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显示出国粹派革命性的一面。在《〈国粹学报〉叙》中，黄节开篇即言这是一个国已“不国”、学已“不学”的时代，原因就在于历史上长期以来“外族专制”从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高压统治。他认为，立国之本为国之精神，而国学则为一国精神之承载，欲灭其国则必先灭其种族，而欲灭其种族则必先灭其作为一国精神之载体的国学，即他所说的“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他认为当时所面对的现实情况也是如此，中国之国体为“外族专制之国体”，其学说为“外族专制之学说”，这就导致国人因不能“自主其国”“自主其学”而沦为国内外异族专制下的“国奴”和“学奴”。那么如何改变这种“不国”“不学”的境况呢？黄节认为答案就在于“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因为这是帝制大行于中国之前“巴克之族”的立国精神之所在。③

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数度疾呼之“光复乎吾巴克之族”，实际上与英籍法国人特利恩·德·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有关。据德·拉克伯里的说法，巴克（Bak）原为米索不达米亚地区一部族，于公元前3千纪举族徙至中亚地区，又在其头领黄帝（Nakhunte，埃兰国王称号之来源）的带领下进入花（即“华”）国。黄帝率领巴克“百姓”（Bak-sing）战胜了蚩尤治下的“黎民”部落，遂定居花国，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④ 德·拉克伯里的这些说法大都发表于19世纪80到90年代，到20世纪初的时候，收入日本人编写的《支那文明史》⑤，而这本书在当时黄节、刘师培和章太炎等国粹派以及反满的革命派中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⑥

德·拉克伯里的学说当时之所以能够吸引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除了它能够巧妙地结合运用当时的考古学、语言学和古史研究的诸多理论知识以外，还在于它适时地迎合了国粹派寻找中华民族特有精神之努力。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经过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以及八国联

① 志贺重昂：《〈日本人〉が懐抱する処の旨义を告白す》，载《志贺重昂全集》第1卷，2-6页，志贺重昂全集刊行会，1928。
② 黄节：《国粹保存主义》，载《政艺通报》，1904（22）。
③ 黄节：《〈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1905（1）。
④ 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 Asher，1894；Martin Bernal.“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Furth（ed.）. *The Limits of Changes：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 96-97.
⑤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博文馆，1900。
⑥ 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载《历史研究》，2010（1）。

军侵华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事件，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就成了众矢之的，在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呼声中需要为这一切负责。将中国文明的源头溯及西方，不但从心理层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所造成的民族自卑感，还从文化和政治层面为反清排满提供了正当理由。既然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在西方，那么现如今满清的腐朽统治正是造成中国民族之独特精神不得彰显的罪魁祸首，因此中国人只有推翻满清腐朽统治，才能像黄节所说的那样，“自主其国”“自主其学”，光复“吾巴克之族”，重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

虽然黄节和章太炎等人接受了德·拉克伯里的学说之后不久就又放弃了该学说①，但他们并没有怀疑汉人文化作为“立国精神”之不可动摇的地位，因此放弃中国文明西来说也没有动摇他们反清排满的决心。事实上，他们放弃或者修改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原因也很值得玩味：虽然这一学说能够暂时缓解中国在与西方竞争中处于下风的局面所带来的屈辱感，但该学说也因其所隐含的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的预设，不可避免地给国粹派的主张带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顺着西方自古就优于东方的逻辑推论，则中国文明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就会永远处于劣势，因此通过提倡振兴一国特有之精神以达救亡图强之目的的说法，就会因为变得缺乏根基而失去意义。因此，从黄、章等人一开始对德·拉克伯里学说迫不及待地接受，到接受之后又匆匆放弃，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对待西方文化影响方面所表现出的欲拒还迎的矛盾态度。

四、作为模仿对象的日本国学与古典学

无论从学术还是从政治上，国粹派的排满革命倾向以及对据说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精神的“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的提倡，在性质上与日本的国学运动也有相似之处。日本的国学研究，用后来日本学者自己的话来说，“与追索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儒家的研究相对，要努力从日本自身古代社会中挖掘出更高的理想社会，这即是支撑国学运动的强烈的信念”②。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试图通过对日本本土古典作品的研究来探寻日本固有之“道”。具体实践中，这些学者深受日本古学派的影响，希望剔除儒、佛等外来思想因素，力求在对《古事记》《万叶集》以及《日本书纪》等记录日本古代语言、文学、习俗、制度等相关文献的考察中，重构理想的古代日本社会，以复归“记”“纪”时代的“大和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国学运动，呈现出清晰的脱儒、排佛、复古特征，在日本民族性格构建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日本的国学运动，根据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轨迹，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荷田春满为代表，他可以说是日本国学的首倡者。荷田春满熟悉日本古史和古文献，具有强烈的民族观念，极力主张在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汉学之外，别创日本古学，综合对日本语、日本史以及日本文学的研究以建立日本国学。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为荷田春满的弟子贺茂真渊以及贺茂真渊的弟子本居宣长。如果说荷田春满所创立的日本国学仍然以儒学为阶梯，那么到了贺茂真渊手里，日本国学表现出强烈的反儒学色彩，标榜的日本“古道”乃天地自生，不但儒学在这个古道中找不到位置，甚至连汉学作为一个整体都成了日本国学的对立物。本居宣长则更进一步，他阐发的日本古道，本来就是由神授天命的日本天皇所代表，只是由于儒、佛等乱世小教的渗入，才导致了后世的祸患，因此回复古道，全在于去除外教影响、回归日本本民族经典。通观日本国学在这一时期的长足发展，其领袖人物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学的反动与否定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一时

① 参见黄节：《黄史》卷1，载《国粹学报》第3册，1905（1）；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民报》第15号，1907－07－05；章太炎：《排满平议》，载《民报》第21号，1908－6－1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册，252－2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载《历史研究》，2010（1）。

② 开国百年记念文化事业会：《明治文化史》第5卷，480页，洋々社，1953。

期的日本汉学就是通过贬低侮辱汉学，来彰显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自豪感。第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平田笃胤。与其前辈相比，他既不像贺茂真渊那样擅长文学，也不如本居宣长那样精于文献，他对日本国学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学说的强烈宗教色彩。他所著的《古道大意》等书，将死后世界也纳入了国学的范畴，宣称日本民族受祖先神灵荫庇，宜于保存传递古道，这足以证明日本作为神创的国家，虽然不大，却是万国之首。而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于日本的文化和历史，而且与其人民、地理环境和物产相适应，这就让日本的国学被进一步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①

综观日本国学的发展，几代国学家一脉相承，其前赴后继致力于建造独立“日本精神”的努力有目共睹。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对中国文化的贬损直至彻底否定。在日本国学运动一百多年间几代“国学大人”的学说中，汉学，尤其是儒学，就是作为以复古神道思想为核心的日本国学的“他者”和对立面而被批判并取而代之的，尽管就连日本国学所崇尚的“道”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来说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影响。最后，经过江户时代几代国学家的努力，以复古神道为内核的“纯日本文化”借由对排他的日本经典的诠释得以建立，近代日本民族个性的建构因此得以完成。从此，反映日本民族意识的日本国学就与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学和研究西洋事物的兰学平起平坐，并与二者一道构成了近代日本思想的三大板块，这也为江户时代之后的明治时期提供了思想资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明治时期发展起来的国粹主义风潮对于“纯粹”日本民族精神和日本民族及文化至上思想的强调，与日本国学运动的核心内容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日本近代国学运动在明治时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政治思想角度来看，日本国学运动时期的“尊皇攘夷”思想——即对日本天皇的神圣权力和地位的强调——与后来国粹派中的国家主义倾向也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而国学家与国粹派对于日本民族和文化优越性的强调，更是暴露出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要素，因之被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日本发动对外军事侵略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源泉。

将明治时期的国粹主义风潮与江户时代的国学运动结合起来考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清末民初受其启发和影响而在中国掀起的那场国学运动。② 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学”和“国粹”的概念，最初都是经由留日或旅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介绍到国内的。之所以会引入这些概念，恐怕与1895年甲午中日海战的结果及其所造成的影响直接相关。在寻找日本作为蕞尔小邦完胜泱泱大国的原因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日本近代以来的学术、文化和政治史——尤其是国学运动和国粹主义风潮——的经验中寻找答案，从而深刻地认识到重塑中华民族性格的紧迫感和必要性。从早期国学运动的积极分子国粹派那里，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模仿日本国学运动建立“中国古学”的主张，看到他们为寻找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头、甚至不惜借助通俗日文书中所介绍的德·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论调，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说成是与西方人同源的西亚部族首领；像江户时代的国学家和明治时代的国粹派们那样，他们试图以所谓的从黄帝传到孔子的古代经典为基础，建立起纯粹的尚未被帝制和异族统治污染过的中华古学，并以此为基础重塑中华民族的性格。顺着这个思路，满清政府所代表的异族统治思想就成了国学的“他者”和对立物，必须要从国学的研究中剔除出去。可以这样说，满清政府统治思想对于清末民初的国粹派而言，正如同儒学、佛学之于江户时代的日本国学家们一样，都是国学反对的对象。

---

① 对日本国学分三阶段的描述，参见赵德宇：《日本近现代文化史》，54－6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栗田元次：《日本近代史》，81－82页，174－176页，206－208页，正中书局，1947。对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发展的研究以及20世纪早期中国国学运动与江户时代国学的共通之处，参见王小林：《从汉才到和魂：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0－24页，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

② 刘梦溪：《国学与红学》，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刘梦溪：《论国学》，载《论国学》，38－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余英时：《“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载《国学学刊》，2011（2）。

当然，清末民初的国粹派还意识不到日本国学和国粹主义思想所包含的民族优越感、天皇神圣性和国家主义思想的危险性，还看不到这些思想在日后会被发展成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成分，而他们借鉴东洋邻国这些思潮和经验的首要目的，即是当下的紧迫要求——救亡图强。而对于西学，则如同江户时代的国学家和明治时期的国粹保护主义者，同样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性，甚至可以将其合理的部分纳入到国学当中，就像前面所引黄节的原话："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之者，亦国粹也。"① 这样的态度，应当与当时压倒性的排满思潮密切相关。而当我们讨论清末民初国学运动的兴起时，不宜再简单地将国学归为西学的对立物，也不宜再将西学看作是国学的"他者"，而是应该充分认识到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将国学放到运动发生的具体语境中去考察。事实上，清末民初以及之后二三十年代国学运动的发展证明，西学不但不是国学的"他者"，反而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参考作用，成为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重要催化剂。

五、《国故论衡》与"科学精神"

如果说最早一批受东洋国学运动和国粹风潮启发而在中国鼓吹国学的学者也曾努力根据自己的文化和学术传统在中国建构类似于日本人所提倡的"古学"，② 那么，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种努力的方向就发生了改变：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诸如爱国为国学之本、尚武为吾国国粹以及文学、绘画、诗歌、书法、甚至"三寸金莲"和"北平六粹"这样的东西是否为国粹之类的争论，转移到区分"国粹"与"国渣"的方向来，因此就主张有必要首先花力气对"国故"进行一番整理工作。③ 回过头去看，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开始的这一转向，不但为中国国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重新设定了方向，而且真正从学术组织、学者培养和研究实践等方面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契机和经验，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④ 这一转型既与先前的国学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要素，是新一代学人有意识地探索中国人文学术新路的见证。

"整理国故"这一著名提法，通常是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但"国故"一词，却是与国学运动最早的发起者之一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有关。《国故论衡》于 1910 年出版，主要从小学、文学、诸子三个方面——每个方面均包含多篇论述——对传统学术作了较为系统的批判。该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却被当时的学人公认为"科学"地整理国故的开始。比如钱穆，就将《国故论衡》看作是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著作，因其能"将旧传统逐一加以新观念、新批评"，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比如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都产生过较大影响，因此他认为"民初新文化运动，实亦一套《国故论衡》"而已。⑤ 即使对《国故论衡》不乏批判的毛子水，在指出其"'好古'的毛病"同时，也承认"一大部分的'国故学'，经过他（即章太炎。作者注）的手里，才有现代科学的形式"。⑥ 事实上，胡适本人也承认自己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对章氏《国故论衡》评价极高，而且他的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无论从观点还是材料来说，均被认为"颇多

---

① 许守微：《论国学无阻于欧化》，载《国粹学报》，1905（7）。

② 邓实：《古学复兴论》，载《国粹学报》，1905（9）。

③ 蔡方忱：《振兴文学以保存国粹说》，载《艺文杂志》，1917（1）；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1919（1.5）；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载《东方杂志》，1925（4）。

④ 这里说的现代化与西化语义基本重叠，均是从现代化 modernization 的基本定义发展而来，指的是在获得发达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时而经历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从当时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这些均被看作是西人的创造，因此现代化也可被称作西化。本文使用现代化和西化都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参见威廉 A.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575－58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⑤ 钱穆：《学术传统与时代潮流》，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23 册，49 页，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

⑥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1919（1.5）。

采自太炎之《国故论衡》”。①

如果仅从提出时间来看，附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末尾傅斯年计划写作的《国故论》一文提纲中所提到的“整理国故”之方法，比胡适大约同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倡导的“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还要略早②，而且二者的精神实质和时代气息也确有共通之处。傅氏在其提纲中指出，“整理国故”和“追摹国故”是研究国故的两种手段，但“追摹国故”只是丧失理性与自我的“愚不可及”的低劣模仿，只有“整理国故”“把我中国以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才能真正有益于中国学术和世界科学的发展，就如梵文的发明“使得欧洲言语学上得个新生命”、婆罗门经典有益于叔本华哲学、“澳洲生物界的发明”为“进化论的原理上得些切实的证据”那样。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国故就变成了学术事业，国故本身也成了学术研究的材料，而不是需要人们去坚守的某种主义；同理，国粹也因此成为国故的一部分，本身并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条件和资格，而是只配被送进博物馆以供展览，让掌握了“科学的主义和方法”的学者加以研究。③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傅斯年的眼里，国故作为研究材料，与中国当时亟待输入的来自于东洋和西方的新知识相比，其重要性和地位并不能等量齐观；前者要大大低于后者，“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傅氏所持的这一贬低国故的态度，与前面他所说的“整理国故”有利于世界科学发展的那些例子所反映的精神是一致的：作为供人研究的历史材料，与中国亟需学习的现代理念和知识相比，国故也仅能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④

六、整理国故与新国学

尽管傅斯年较早地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但当他看到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后，钦佩之余，感觉已无必要再作己文，因此只将计划写作的《国故论》提纲附识于后了事。而胡适则在毛子水的文章和傅斯年的提纲发表之后，持续撰文讨论提倡“整理国故”，从而使得国学运动得以转向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是他发表在《国学季刊》上的《发刊宣言》，更成为因这一转向而形成的“新国学”运动的行动纲领性文件。无怪乎顾颉刚评价章太炎和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作用时说：“整理国故的呼声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计划。”⑤ 如果说对国故展开系统的考究工作始于章氏之《国故论衡》，之后受章氏影响的一代人（比如毛子水和傅斯年）开始呼吁要对国故开展“科学”的研究，那么正是胡适的努力推动才使得“整理国故”得以在实践中有声有色地展开。

人们之所以愿意响应胡适的号召，恐怕与他“发现”了清人学术传统中的“科学”要素不无关系。在其1919年12月开始连载的长文《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中，胡适虽然对清人的学问不乏批评，却通过举例认真梳理了可称为“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的清代音韵学、懂得使用“归纳的方法”的清人训诂学以及初具“科学的精神”的清人校勘学。⑥ 如果国故对于新知识而言只是类似于梵文之于欧洲语言学、婆罗门经典之于叔本华哲学、澳洲生物之于进化论，即其重要性不过新知识

---

① 钱穆：《学术传统与时代潮流》，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45页，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关于胡适高度评价《国故论衡》一书之成就以及自己所受章氏影响之语，可参见胡适之：《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一部分，初刊于《申报》上海版，1922-10-10（http://www.sbsjk.com/spring/front/data/tobook，accessed on 10/22/2022），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再版自序》，3页，崇文书局，2015。

②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载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3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③④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1919（1.5）。

⑤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载《古史辨》第1册，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⑥ 胡适：《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从1919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月刊》连载，后经修改重新命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后收入许啸天主编：《国故学讨论集》，79-105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

的百分之一，那么“整理国故”的意义和价值就难免令人生疑。但当胡适这位留美博士撰文声称清人治学含有“科学的精神”时，整理国故就不仅仅是整理被动的历史材料，而是能够在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于其中发现可与新知识沟通和对话的“科学价值”，从而使整理者增加对自己的学术传统的信心。这就大大提高了整理国故的价值和必要性以及新一代学人从事这项事业的积极性，并以此为契机，在实践中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转型提供了动力。①

就在《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开始发表的同时，《新青年》还刊登了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在这篇并不很长的文章里，胡适重点解释了“新思潮”的精神实质、手段与趋势、对旧有文化的态度以及“新思潮”的目的。胡适将“新思潮”定义为用以“重新固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中表现为两种趋势，即“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他将这两种趋势又称作“新思潮的手段”。“研究问题”既是正在经历根本变化的社会的需要，也是这一社会背景下大多数人的需要；而从外界输入学理，则正是为了促进问题的研究并帮助解决问题，客观上“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只有带着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审视旧有的一切，才有利于切实研究人生问题，接受输入的学理，从而培养“研究的、评判的、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将“新思潮”的批判精神和态度应用到对旧有学术思想的研究，胡适认为，在对待旧有学术思想所持的盲从、调和以及整理国故的三种态度中，只有整理国故才算得上是积极的。具体来说，整理国故包括以下四个步骤：首先是对没有条理、不系统的古代学术思想进行有条理、有系统的整理，接着要对古代学术正本清流，弄清楚各种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和影响，第三是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古代学术进行考证，弄清古人思想的真正含义，最后一步则是在综合前三步工作的基础上，还原古代思想的真面目和真价值。使用“科学的方法”对国故进行整理，在实践中自然也就是对盲从和调和的反对与拒绝，其终极目的就是在批判性地整理国故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即通过对问题的逐个解决来完成对旧有文明的改造，“一点一滴”地造就新的文明。②

在此，虽然胡适没有对“新思潮”试图再造的文明作进一步解释，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他将“整理国故”、批判精神、科学方法和“再造文明”放在一起考虑、以输入的学理以及对当下和历史问题逐个展开研究为途径来实现“再造”的目的，那么他所呼唤的新文明就自然与中国古代学术和自外界输入的新思想、新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而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呼吁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又在几乎同时发表的《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中“发现”了清人学术思想中的“科学”精神，这既为整理国故的实践提供了积极的动力，也进一步体现了这个时期追求“新思潮”的中国学人主动“谋贯通中西”、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固有的学问”以重新定义国学的自觉意识。③ 而这种自觉意识，在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于1923年1月《国学季刊》首期。虽然自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于1919年早些时候发表以来，胡适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表达他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④ 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是其中最为集中最为清晰地表达出他的思想的一篇，也因此对国学和中国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首先指出了当时以及此前国学运动的两大认识误区，一是某些人盲目排外，二是试图从孔教、古文古诗甚至迷信中寻觅保存古学。接着，胡适从明末至20世纪20年代这三百多年间古代学术的发展中，梳理出国学研究的三点成就和三个不

①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42－45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② 文中引用内容参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551－5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③ 蔡元培：《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296页，中华书局，1984。

④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载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327－3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足：成绩体现在清人在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和发现古物三个方面的贡献，而不足则表现在他们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过于注重对材料的考证功夫而忽略了对材料的理解和贯通、以及由于视野狭窄而导致参考比较材料的缺乏等三个层面。① 就这样，通过对传统学术所作的一番梳理，胡适指出了今后国学运动的方向，即在继承清人学术研究中包含有科学方法的那部分的基础上，改正其不足，不但要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注意对材料的系统整理，而且还要博采可供参考比较的材料以提高加强对传统学术材料的理解和解释能力。②

胡适在讨论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时，首先明确定义了他心目中的国学：

>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也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隘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③

虽然过去也有人将“国学”定义为“无所不包”的“中国学术”，将国学说成是过去中国所固有的一切学问，④ 虽然过去也有人提到“国故”和“整理国故”，提到“科学”的方法，却鲜有人像胡适在这里所定义的“国学”这样具有革命性。他首先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的缩写，又将“国故”解释成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从而“国学”就变成了对中国过去一切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接着，胡适进一步强调了“国故”的中立性，认为这一名词既包含“国粹”，也包含“国渣”，本身并不包含褒贬判断。最后，基于这两点理解，胡适将“国故”看成是历史文化资料的整体，“国故学”也就变成了对这一资料整体的整理，因此，“国学”和“整理国故”便具有了近乎对等的对应关系。可以这样说，胡适“国学”定义的革命性，就在于他把“国学”定义成了研究过去的学问，变成了文化历史学；这一定义在拒绝“国粹”思想的狭隘与偏激的同时，也一改自民初以来兴起的国学运动的方向，可以说是此文最具引领风气的部分。

既然“国学”即是对历史文化材料的整理，整理就需要有系统有条理。胡适在这里指出了三步系统整理法，即（一）索引式的整理，类似于字典检字索引；（二）结账式的整理，类似于集解、释文、注疏一类的学术总结性著作；（三）专史式的整理，即在根据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做成文学史、哲学史、宗教史、经济史等专门史的基础上，还可以将文化史的研究进一步逐层分成相应的子系统进行研究。胡适在文中也指出，这三个步骤中的前两步，清人著述已有发明，可谓研究国学的必要准备，但根据他对国学的重新定义，国学的最终目的在于使用历史的方法来“整理”和“做成中国的文化史”，也就是利用前两步的“国学的设备”来做第三步“专史式的整理”工作。可以这样说，如果说对国学的重新定义为国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这里提出的三步整理工作就是新国学运动的行动纲领。

最后，胡适强调了“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他首先指出新国学应该与过去国学运动片面强调国学为一国固有之学术、拒绝比较研究的倾向区别开来，改变孤陋附会的顽固做法；强调要勇于、善于学习西洋治学方法，并分别从文法、音韵、制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方面举例说明借鉴西方经验、与西方世界比较所带来的启发性成果。他认为，新国学的成功开展，在态度上要求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在实践中需要学习欧美日整理材料的成就，只有这样，我们

---

①②③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第3册，9、9、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④ 孙德谦：《国学研究法》，载《大夏周报》，1934（29）。

才能补救过去三百年学术的积弊，发扬并光大清人学术中已经萌生的科学精神。而这也正是新国学的前途所在。由于欧美以及受欧美影响的日本学术在使用索引式、记账式和专史式等方法整理材料方面比当时的中国更为成熟，所以欧美日本也是我们在系统整理国故时需要虚心学习的榜样。因此，“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也可以被看作是新国学的落脚点。

就整篇宣言看来，胡适首先通过重新定义国学，从理论方面开辟了国学运动的新方向，并从而扩大了国学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接着，在总结清人学术的成就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实践纲领，即索引式、结账式和专史式的整理方法；而最后的落脚点，在于不囿于一国、不固守陈规，在于向西洋学习科学方法和新知识，以改造中国学术、再造中国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在这里所倡导的新国学研究，其实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的手段，是主张采用西方学术方法和研究目的对中国过去一切学术的重新整理和再建造。

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所说的新国学理念和整理国故的方法，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在之前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付诸实施。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兴起的标志之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于 1922 年 1 月成立，为北大研究所下设四门“专门学术”（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最先成立者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 1919 年之后“整理国故”的呼声在学术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国学门之所以能于北大研究所四门之中脱颖而出首先得以付诸实施，除了 1919 年以来“整理国故”的呼声日益高涨，与章太炎对国学的倡导也有可见的联系。北大校长兼北大研究所所长、研究所的发起人以及实施改组的最关键的人物、对国学门成立的坚决支持者蔡元培，不仅是章太炎的同乡，而且曾与章氏共同成立过中国教育学会，与章太炎系多年旧交，而且他出任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也得到了已在北大颇有根基的章氏门生如沈伊默和夏元瑮等人的支持。② 不仅如此，1921 年筹划改组国学门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2 至 1927 年间一直担任国学门主任的沈兼士，之所以能被委以此重任，除了他本人思想进步、在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外，与他作为章太炎弟子这一身份也很有关系。③ 事实上，兼任国学门委员的诸位教授如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和胡适等人，除了胡适，其余均系曾经留日的章氏门生。国学门的这些骨干分子，不但同乡、同门、具有共同的留日背景，而且均受到章氏国学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举办北大研究院国学门这一事业方面，他们之间更容易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的办学成效。④ 当然，国学门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也吸纳了具有留法（如徐旭生、刘复、李宗侗、张竞生）、留美（如江绍原）、留德（如林语堂，留德前亦曾留美）背景的其他学者加入到国学门委员中，他们对国学门的发展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⑤

根据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简章，国学门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的专门之学，所以国学门的教授也以文、史、哲教授为主。前面提到的国学门教授中，沈、马、钱、周属国文系、朱为历史系、胡为哲学系。国学门的宗旨，根据 1922 年初《北大日刊》刊登的国学门成立启事，乃是“整理旧学”，⑥ 而北大对于旧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文、史、哲三系。当然，国学门委员的队伍并不限于文、史、哲三系，国学门成立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又陆续吸收了蒋梦麟、马衡、

① 蔡元培：《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要》，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 4 卷，134 页，中华书局，1984。

②③④⑤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2－17、80、81、82 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⑥ 《研究所国学门启事》，载《北大日刊》，1922－02－22。

周树人、徐旭生、张凤举、陈垣、李四光、袁同礼、沈伊默等人。不仅如此，国学门还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担任国学门的“导师”和“通讯员”，“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通讯员”则类似于顾问，为国学门的发展献计献策，王国维、陈寅恪、夏曾佑、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伊凤阁（Aleksei Ivanovich Ivanov）、柯劭忞等先后担任过国学门的导师，而罗振玉、伯希和（Paul Pelliot）、金西龙、泽村专太郎等人先后担任过国学门的通讯员。① 可以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是一个兼容并包、中国和东西洋兼蓄，“有遗老、复辟党、国粹论者、帝国主义者”的学术综合体。② 这一综合体的成立，不仅仅体现了当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迅猛发展，它更是20世纪20年代新国学气度的集中展示。

国学门“整理旧学”的宗旨，本来就与“整理国故”并不矛盾，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系统阐述的新国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其中详细论述的“整理国故”的三大步骤，相当于是为国学门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国学门下辖五会三室。五会包括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考古学会和明清史料整理会五个学会，三室即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虽然它们之间相对独立、各有自己的负责人和会员，但它们共同的任务都是对相关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三室是国学门同仁工作、研讨、编辑、出版的地方，既包括期刊、也包括著作的编辑和出版，而著作则既包括国学门同仁所著也包括他们所编之书。“五会”中歌谣研究会成立最早，于1920年12月成立，周作人担任其主席，主要负责对民间歌谣的征集和整理；明清史料整理会原称为整理档案会，1922年5月成立，主席为陈垣，以整理研究明清内阁档案为己任；考古学会原称为古籍古物调查会，1923年成立，由马衡担任主席，主要推动古迹古物的调查、发掘和保存研究工作；风俗调查会成立于1923年5月，先后由张竞生和江绍原担任主席，主要从文字记录和实物调查方面进行对风俗的整理和研究；方言研究会成立于1924年1月，负责人为林语堂，负责调查中国各地方言，并计划编写方言地图。

五大研究会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得到了校方的充分支持。除经费资助外，校方还于1923年11月特将位于北京北河沿第三院的工字楼专拨给国学门使用，以便于他们存放、陈列、整理资料，开展工作。比如，北洋政府交由北大整理的八千麻袋明清档案材料，就是经由明清史料整理会组织整理之后，存放于工字楼二楼的十个房间内。由风俗调查会和考古学会收集来的物品、古物、标本等，也存放陈列在二楼。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经过几年的努力，国学门除了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收集整理了大量古器物、风俗物品、明清档案，并将陈列开放供人参观，让人知道国学门不仅是培养学生、进行研究的学术机构，它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大学博物馆的作用；该博物馆不但收集整理古器物，而且收集整理文献材料，也是中国模仿西方大学建立研究所的成功范例。③

北大国学门以培养学术专门人才为己任，招生范围涵盖北京大学已毕业和尚未毕业学生中有志于国学门专门研究者，通过教授指导或通信研究的方式，由国学门主任延请北大教授或国内外专门学者进行指导。至于培养的方式，北大研究所《简章》里明确指出为“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以培养具有专门知识人才为目的③；研究生所研究的题目，无论由自己提出还是由导师指派，均属就某一问题展开的专门研究，鼓励学生以问题为导向，“提出题目以范围愈狭性质愈具体者为宜”④。国学门的这种培养学生的方式，基本上完全仿照欧美大学和研究所建制和运行机制，

①③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82－84、89－9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② 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载《国学门周刊》，1926（13）。

③ 蔡元培，《公布北大〈研究所简章〉布告》，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439页，中华书局，1984。

④ 《研究所国学门启事》1922：1.23，北大档案，全案号：7/目录号：第7号/卷宗号：131。转引自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85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虽然研究的都是中国的国故，但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从 1922 至 1927 年 46 名国学门研究生所研究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虽然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提到的三种整理国故的方法都在这些题目中有所体现，但绝大部分的题目都属于对中国文化的“专史式”整理研究，内容涉及文学、史学、语言文字、思想史、甲骨金文、民族史、历史地理、法制史、经济史、风俗史等不同领域，从研究视角、方法和内容方面均显示出向现代学术研究转型的特点。①

以上对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开办目标宗旨、运行机制、人员构成、学生培养等方面的简要介绍，足以让我们看到当时中国学术发展的新变化。在整理国故这面以全新方法重塑中国古代学术的大旗下，走在时代最前列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不仅从学术范式和学术理念上已经步入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型的进程，而且还仿照欧美现代化大学研究所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将现代学术的理念与范式引进到中国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的实践中，从各个方面都实现了对传统学术束缚的突破，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转机。这一实践与 1919 年以来、尤其是胡适的一系列论述所呼吁的整理国故的主张相因应，无论从理论方法还是机构机制，完成了国学运动从发扬国粹到整理国故的“新国学”的转化，既明确了与传统经学的决裂，抛弃了旧有学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又系统阐明了借鉴欧美现代学术方法和知识，从研究机构、学生培养、学科架构等各个方面对西方学术和教育制度进行模仿，实质上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里程碑式的试验。

这一试验，尽管并非没有问题，却凭其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激发了多地国学研究机构的设立，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学习西方现代方法和知识于是形成一股风潮，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成立于 1924 年的著名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国学研究院，就是在这样的风潮中应运而生的。就像北大研究所成立之初的设想一样，清华学校也试图模仿欧美研究所以成立自己的研究机构，原拟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科研究所，但因为经费所限，决定先开办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成立的目的，即期待研究院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均有精深透彻的了解，在于采用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来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② 国学研究院所延请之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要么学贯中西，要么接受西学训练，都是谙于西学、较早以西学之法研究中国材料的专家通人。而国学研究院的最终改组，也是与清华学校变成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功能与清华大学相关院系研究所衔接的结果。可以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最终停办，是与清华学校完成向学科完备的现代化大学过渡密切相关。

这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新国学”的使命：“新国学”提倡以科学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从研究领域来看大致涵盖了现代学术的文、史、哲三大学科，当文、史、哲学科在各大学的学科建设中逐渐成熟、发展到足以承担起自己学科研究所的职能时，“新国学”以及那些应运而生的国学研究机构的使命也就得以完成，因此国学院也就可以停办、而将其职能分散融于文、史、哲各学科里了。

八、结论

当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并非当时仅有的国学机构。按照曹聚仁的说法，当时的国学，“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

①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85－89 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②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周刊》351，1925－09－18。关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缘起、成立、发展以至于停办的描述，可参见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①。所谓“赛先生之国学”，即毛子水、傅斯年、胡适等人所倡导、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和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所代表的整理国故的科学的国学；所谓冬烘先生之国学，与无锡国学专修馆所采用的旧式书院教学管理的模式有关②；而神怪先生之国学，应该与上海国学专修馆所属之会道门组织同善社的民间宗教性质有关。③ 在曹聚仁看来，这三家虽然都称自己的事业为国学，却“决无合作之余地”，人们需要“认明商标庶不致误”。④具体来说，后二者的国学理念显然与科学的国学较少兼容，而同善社之国学专修馆所宣扬的则根本就不是国学：“盖吾辈若承认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为‘国学’，则无锡国学专修馆、上海国学专修馆所研究者，决非‘国学’；若承认同善社之‘国学专修馆’为‘国学’专修馆，则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北京之国学研究所，必非‘国学’专修馆、‘国学’研究所。”⑤鉴于此，曹聚仁强烈主张，因其难以成立，所以“国学”一词必须被废除，必须被“轰”掉，而以“国故学”之名取而代之。⑥

曹文对国学的看法，其实在当时一批有思想的学者中很有代表性。成仿吾将当时从事国学运动的人分为三类——即学识孤陋之学者名人“据国学为孤城者”、旧儒宿学惟擅国学“乘机倡和者”以及一大批不会独立思考的“盲从派”，这些人缺少科学的素养和方法，他们的国学运动所产生的也不过是“考证几篇，目录几个”，因此必须要阻止他们“勾诱青年学子去舔舐这数千年的枯骨”。⑦ 何炳松则列举了来历不明、界限不清、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学术以及对“国”字含义的误解和滥用等七大理由之后，呼吁时人联合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像欧美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那样，“用分工的办法和分析的功夫”来研究中国。⑧ 郑振铎则更进一步，在呼吁“打倒所谓国学家”、“且慢谈所谓国学”的同时，明确提出“全盘输入采用西方的事物名理以建设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以改造个人的生活”的主张；与毛子水、傅斯年、胡适等人的主张一致，郑振铎也认为，整理、研究古学的人“也不可不懂得基本的科学知识与方法”，而当务之急，就是要“建设巨大的外国文书图书馆”“建设各种科学的专门研究院、实验室”以及大量“翻印或译印科学的基本要籍与名著”。⑨

这些论述和主张，也从另外的侧面告诉我们，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新国学自觉地对国学旗帜下的不同主张和事件加以识别，从内容、性质、方法和实施机构等层面将对“国学”和“国故学”的研究进行区分。就像从前文对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样，就内容层面而言，新国学属于国故学研究的范畴，实质上是引进欧美东洋的科学知识和理念，采用外来的学问、使用外来的概念和科学的历史文化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与文化。从实践层面上而言，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一批知识分子，自觉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大学研究所的形式，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高等教育机构设立研究所研究国故，筚路蓝缕，从教学、科研、材料和古物整理等诸多方面为国故学的现代研究做出了表率。本质上说，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蔚然成风的新国学运动开启了国学甚至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开始兴起的国学是以中国文化本位的观念为起点、在弘扬和回归中国传统

---

①④⑤⑥　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载《时事新报》（上海），1926－02－28。

②　胡子远：《唐文治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纪念唐文治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载《苏州大学校史研究文选》，284－288 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载《现代中国》，197－213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③　桑文轩：《同善社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⑦　成仿吾：《国学运动之我见》，载《创造周报》，1924（28）。

⑧　何炳松：《论所谓“国学”》，载《小说月报》，1929（1）。

⑨　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载《小说月报》，1929（1）。

文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体现。与20世纪初的国学运动相比，这次“国学热”的发生和发展也带有较强的政治动机，国学概念与国家政策走向和民族文化精神重建这样的问题关系密切。更有意思的是，前者发展到20年代之后变成了学术问题，其结果是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进程；而90年代“国学热”的发展，虽然后来也走向了学术，不过与20年代学习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方向相反，这一次是返回被20世纪上半叶的国学运动打倒了的经学和改造过的史部、子部、集部之学，试图从古人传下来的智慧那里寻求解决当下世界问题的答案。

虽然国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没有相应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学的末路，事实上国学依然可以作为学术存在而且可以大有作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本质上是鞭挞传统文化之尸，那么90年代开始兴起的“国学热”就是试图让僵尸返生；虽然二者均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但后者却给了传统文化得以重建的机会。但是，重建传统文化却并不是重返经学，也不是回到传统的书院教育模式做冬烘先生的国学，而是合理使用传世与新发现的材料，结合当下的问题，在现实与传统交汇的语境中重建有生命的、有意义的传统文化。传统不是一间脱离其具体历史与现实环境而孤立存在的老屋，脱离其历史语境的传世经典也不会传载智慧，更不是通往这样的老屋的门径，而一头扎进这样的国学之中断然不是对传统的有意义的重建。也就是说，有意义的国学不是读经班，不是弟子规，不是回归女德，更不是唐装汉服，而是利用已有材料带着问题意识对过去社会发展的无数瞬间的合理重建；这样的学术建构努力也不是为废弃的老屋添砖加瓦，不是复古与守旧，而是在满足我们对过去社会的存在与运行的好奇心的同时，也能在学术思考的过程中发现过去对于我们当下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启发。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Guoxue* Movement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ZHANG Hanmo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examining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guoxu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turning point of its development in 1920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Chinese *guoxue* reflects the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 study of archaic China made by the earliest groups of Chinese scholars traveling to Japan to study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5, who we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trends promoting Japanese national pride of its own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archaic Japan. What differentiates Chinese from Japanese *guoxue* is that Chinese *guoxue* considered the Manchu rule as the other in its initial phase, while Japanese *guoxue* regarded classical Chinese scholarship as the other. Neither Japanese nor Chinese *guoxue* promoters argued strongly against the western influences. In 1920s, Hu Shi, representative of a group of like-minded Chinese scholars, redefined *guoxue* as an academic field studying all the materials related to China's past with the guidance of modern scientific way of categorizing and arranging knowledge. Following this trend of scientifically arranging knowledge related to China's past, *guoxue* institutes appeared in Beijing and other places in China from 1920s and this initia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Key words: *Guoxue*; National essence; Arranging materials related to China's past; Traditional learning; Modernization